

# 烟潍公路的“红色印记”



吕杰

从朋友手中收集到的一张泛黄老报纸，报头位置写着报名《胶东日报》，下方写有原名《大众报》，为第二四九五期，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七日发行，本期共两版。

在报纸的二版左上部分，有一篇关于烟潍公路通行的布告，原文主要内容如下：《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、胶东军区司令部联合布告》(路字第一号)查烟潍公路，连年因战争，未便建立路政管理工作，各种车辆，尽皆通行，路面时被破坏，反复修补，不仅疲劳民力，阻滞运输，而车辆行人往来拥挤，致有纠纷与危险事件之发生，时值全国胜利在望，解放区运输事业，日益发展，支援战争运输任务，将更为繁重，因而公路之管理工作，亟需建立，以保障车辆顺

利通行，避免车辆肇事，安全行旅，现烟潍公路已开始修复，附路亦修补竣工，为此特规定：一、凡公私之铁轮、木轮、硬胶轮大小车辆，应一律在附路上行驶，严格禁止在公路上通行。二、凡行驶之车辆及行人，一律靠右边走；如车辆发生故障，亦应靠右边停下，但不得两边同时停车。三、雨后路面不干，禁止通行；如有特殊紧急任务，应持有专属、军分区以上之证明文件，并与公路段、站取得联系，方得通车。四、凡路旁设立之摊贩，一律要搬到排水沟以外，以免障碍通车或发生危险。五、凡排水沟两边之树、草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剪伐，亦不得于排水沟内取土。六、车辆行至城市，须受交通警察之指挥，行于公路，应受公路段、站养路人员之指导，沿路各村民兵、自卫团亦有保障公路及维持交通秩序之责。以上规定，自公布日起实施。仰各公私大望，解放区运输事业，日益发展，支援战争运输任务，将更为繁重，因而公路之管理工作，亟需建立，以保障车辆顺

可见，在全国胜利解放的前夕，烟潍公路为保障交通，

“先行”开始维修，为告知广大群众，在当时的《胶东日报》上刊发了一则类似今天施工公告性质的布告。

让我们沿着时间脉络，追溯一下烟潍公路。自秦时起，该路就是驿道、官马大道，民国初期成为举足轻重的省内交通干线。并有过“车马会青莱之道”的辉煌。

而自1938年2月日军侵占烟台后，至1945年秋，沿线军民为打击侵略者，不断破路袭桥，致使此线时断时续，烟台仅能勉强通至龙口。1947年秋，国民党军队占据烟台，该路又陷入瘫痪。1948年秋，烟台再获解放，公路管理机构恢复，胶东行署动员数十万民众抢修公路，经广大军民奋力抢修，于次年全线迅速恢复通车。

由此推算，恢复通车后，为确保烟潍公路更畅通、更安全，当时山东省胶东区行政公署、胶东军区司令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烟潍公路通行的布告，刊登在《胶东日报》上。另据《烟台公路志》(1949—2005)记载：“1947年，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的《关于各公路沿线



养护小组暂行办法》，沿线各村均建立养护小组，划段包干，把养路工作作为经常任务之一，为解放战争服务。”

解放之后，烟潍路不断加固维修、改造，后来全部改为沥青路面，路宽也有所增加。跨越的河流等都修建了新的大桥，代替了旧时的木桥和漫水桥，基本达到国家二级公路水平，在较长时间里，是胶东地区西行的主要道路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在解放前后的历史节点上，烟潍路毅然承载起了那时的交通、发展需求，推动着新中国的憧憬和梦想照进现实，这张积淀着岁月痕迹的报纸就是那段“红色印记”最好的见证。

# 教堂：铭记基督文化的痕迹



## 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烟台街头教堂之多，给任何一个游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昔日的《大公报》记者说，有46处之多，几乎每个十字街口都有一个教堂，所言不虚。

这些教堂尽管大小不一，但风格却大同小异。屋脊上都有一个醒目的十字架，墙上都有尖尖的窗户，镶嵌着五彩缤纷的玻璃。它们隶属于不同的

教派，但都定时开放。星期天有教徒走进去虔诚地祈祷，会传出悠扬的歌声，伴着风琴，传得很远……

一座小城，教堂密度之大，教事活动之盛全国罕见，这是烟台文化兼容性的铁证，是文化软实力的宝贵痕迹。

西方传教士在烟台抢滩最早，但烟台却没有“教案”，不是天津，也不是曹县，那里的教案令清朝封疆大吏焦头烂额，令地方官吏革职查办，更别说伴随着腥风血雨了。但烟台平平静静，既上帝保佑，又阿弥陀佛！

可惜现在仍旧完好存续的教堂不多了，在南山路与三马路交会处有一座东山教堂。

它与英国传教士马茂兰的名字连在一起，马氏口吃，下岗了改作花边生意，发财不忘职守，建了这座教堂，墙基上嵌有石碑，令他的同胞十分自豪，拍照不已。

在大马路与十字街交会处也有一座教堂，现在嵌有“天主教堂”的字样，其实，据《烟台宗教志》记载，它是“基督教堂”。“天主教堂”四字乃是1991年，著名书法家叶崧光老先生奉命所写，与历史事实不符。

这所教堂又名“慕雅哥教堂”，慕雅哥何许人也？他是最早来烟的三个基督教传教士之一。当时备极艰辛，无处安身，只好在海边一艘破舢板上藏

身。1867年遇到了捻军东进，包围了通伸，他在到烟台之前，曾访问过洪秀全的太平天国。这个自以为是的洋人，以为所有的中国农民起义军都似洪秀全，也拜上帝教，于是自告奋勇地当“上帝的说客”，勇闯捻军大营，力劝捻军头目，不要开炮，只要布道，结果被捅了17刀，去上帝那里报到去了。

基督教会认为他是“殉道者”，为了纪念他，修了这座设在张裕公司附近的教堂。这件事在通伸立有石碑，正反两面有中文和英文记述。石碑曾立在村道旁，文革中才不见了踪影，不过拓片却在《毓璜顶文化》上得到披露，成为异常珍贵的资料。

# 外国传教士体验胶东火炕

刘建昆

媒体报道，热衷于申遗的韩国如今要抢先为“暖炕”申遗。实际上，韩式火炕“温突”，是地板下的火暖系统，和中国的火炕并不相同。火炕一般是用贯穿一堵墙的烟道，把灶台和睡炕连接起来，烟给炕和房间取暖并最终从烟筒排出去。

烟台开埠以后，外国传教士先后来到胶东。他们对胶东的火炕很是感到新奇，有了和当地人不太相同的体验。

1861年来到胶东的倪维思夫人倪戈氏，在她的著作《我们在中国的生活》中，明确宣称“我很讨厌热炕”，但又不得不说不说“但当地人似乎很喜欢它。”她详细地描叙了外国人眼中的“炕”：“晚上当床，白天当沙发，是整个家庭的消磨时光的地方。妇女们休闲或缝纫时，通常以土尔其人的方式(盘腿)坐在炕上，他们也乐于在炕上吃饭。炕是一个用砖砌成的平台，大约两英尺高，根据家庭需要的尺寸有所变化。有的还没普通的床大，不过经常占据整个房间的一头；有的大约十二英尺长，最少有六英尺宽。其构造是，火点燃后，热量和烟雾得以从下面的烟道通过，使其每一部分都变得很温暖，但又不特别热。因为可以保温很长时间，睡觉在上边

的人不容易患感冒，即便他们盖得很少。”

对于烧炕，她则写道：“你经常能看见一个小女孩在灶台——就像小床，也叫锅台——旁席地而坐，把秸秆从灶门中投入，每次少许，以保持稳定的火焰。”后来，长期居住在黄县的传教士浦其维家族，不但在其居所留下了炕，也留下了不少关于炕的表述和照片。如浦其维夫人浦安娜写道：“白天，那里是孩子们很好的托儿所，缝纫间以及女人们的会客室，上面暖融融的，他们会舒适地盘腿坐在那上面，到了晚上，那里就是家中宽大的睡床。”她把黄县居所火炕的照片收入了著作《从零开始》。他们的女儿浦爱德，打小随父母在黄县生活，对炕的喜爱更是不言而喻，并且留下了一张幼时和弟弟中规中矩坐在火炕上的合影。母女俩在所写的书中都饶有兴味的收入了一则关于火炕的谜语：“团团头，方方腰，一个尾巴一丈高。”

19世纪20-40年代在胶东生活的浸信会传教士柯里培，则有过一次“炕床鲜体验”，他笔下的炕是这样的：“中国人用晒干的泥块做成的砖砌成平台，台上面再砌上泥块，并用灰泥铺平，干了以后再放上草席当床睡。炕床的中间是空



心的，床的靠脚那端放了木柴，冬天时可以让烧饭炉子冒出来的热气从炕底下通过，以使台面温暖。”

有一次，柯里培和几个传教士从莱州到黄县去开会，坐公共汽车回莱州时，刚走了约二三十公里就碰上大风雪，只好在龙口停了下来。他们虽然都穿了厚厚的大衣，可睡觉时只有一条毯子可盖。龙口附近没有西式的旅馆，只有中式的客栈，是没有床的通铺。入住后，柯里培请店里的人用煤生了火。烧了半小时，柯里培觉得炕上面的垫子还是冰的，就请他再添一点煤，可是不肯，说：“你初到此地，你不懂。”柯里培心道：垫子还是冰凉

的，这有什么不懂。但是也没有办法，他决定穿上所有的衣服，并用皮帽子盖住耳朵，裹着毯子睡觉。没料到的是，睡到半夜时，竟被热醒了，全身像是烧起来一样，只好拿掉毯子、脱掉毛里子大衣、解开外套、背心，这才凉快下来。柯里培这才知道，炕上有8-10厘米厚的泥，要很长时间热气才能传上来，可热了之后，可以保持很久都不冷却。

柯里培用“烤熟的背”来形容睡炕的感觉。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母亲常念叨的一句顺口溜：“炕煨皮，睡不沉；皮煨炕，睡到亮。”这正是同一个道理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胶东才有“大小伙子睡凉炕——全凭火力壮”这样的歇后语吧！

3月18日，人文版刊登魏同山《蓬莱潮水惨案》，潮水人杨建人等老先生致电反映，上世纪60年代他们曾专门就潮水惨案做过深入访谈研究，《蓬莱潮水惨案》一文所引资料 and 所述内容与他们所掌握的史料有出入，现刊登杨先生等所著文章，以警戒后人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。

【以史为鉴】

## 难忘潮水大屠杀

杨建人    赵明元    张胜家

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、掠夺和屠杀，那是一段永远也抹不掉的血的历史。

今年是潮水惨案七十五周年。我们潮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小鬼子对潮水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。

蓬莱潮水镇过去是一个四周有高大围墙，有一千多户人家的大村镇。围墙有五个大门，墙外有护城河沟，围墙四周建有五个炮台，重点地段都建有城墙垛口，易守难攻。

1939年2月9日，即1938年农历腊月二十一日，是潮水镇的集日。为了防日本鬼子飞机轰炸，集市从村内中心大街搬到了村东河滩上(日本鬼子曾在1938年农历六月份，飞机轰炸潮水村中心大街，炸死四个平民)。上午九点多钟，从东北巨峰村方向传来枪声，继而又见东门外一群五百多鬼子打着膏药旗向集市方向奔来。顿时，集市乱了，人们四处逃散。

当时，潮水驻扎的是国民党杂牌军蔡晋康的十三、十四两个大队。毫无准备的他们紧急集合，关闭城门，登上围墙，仓促应战。十三大队守南门和西门；十四大队守东门和东北门。上午十点钟左右，战斗打响。日本鬼子兵分两路，重点攻打东门和南门。一时间，机枪、步枪响成一片，战斗十分激烈。这些国民党的杂牌军当时还有点中国人的血性，他们利用城墙上的垛口和炮台的有利地势，居高临下，与日伪军展开激烈对抗，有效地打击了敌人。一个上午，日本鬼子也没有攻进一步。中午时分，十四大队队长王敬尧饭后登上围墙观察敌情，不幸中弹身亡，由彭中队长继续指挥。下午日本鬼子调整战术，佯攻东门，集中兵力攻打南门。到下午三时许，南门被点着火，十三大队队长急令撤退，南门失守。十三大队队长刘月卿在撤退途中，遭敌救援的伏兵射杀身亡。十四大队一看大势已去，也从北门撤走了。双方各伤亡四十多人，日军少佐指挥长小林金次和一个伪中队长也被打死。

日本鬼子打跑了刘、王部，穷凶极恶地冲进潮水街里，开始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。他们见人就杀，见草就烧，杀气腾腾。一股鬼子冲进杨式仁家，不分青红皂白，开枪射击，把屋里的老少五口全部杀死。其中还有一个吃奶的婴儿被他们用刺刀挑死，真是惨绝人寰。张嘉谟一家五口被打死三口；杨廷梓就两个儿子，大儿子被鬼子用指挥刀从脖子处斜劈而死，惨不忍睹；小儿子躲在厕所里被枪杀；东门里有五个外地打铁的，其中三人被枪杀，两个被鬼子用刺刀捅死；李福星一家七口躲在防空洞里，被鬼子烧死五口，打死一口，李福星一人活命，还被烧掉了一只耳朵。更为残忍的是，鬼子抓了三四十个青壮年，拉到东庙台上，用机枪给扫射了。其中一个叫张恩家的幸存者，我们采访时还亲眼见到他肋骨上的伤疤……

日本鬼子不但疯狂杀人，还肆无忌惮地放火烧房、烧草垛。一时间，潮水村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更有甚者，这伙强盗还放火烧掉了我们潮水镇一处宏伟古建筑“天庆庵”。其中两棵五百多年的银杏树也被烧死。

七十五年前的腊月二十一日，潮水镇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。被鬼子屠杀的人数达108人(含飞机炸死4人)、被烧毁房屋70多间、草垛90多座、古建筑一处。本来繁华兴盛、名噪蓬莱的一座名镇，转眼间被鬼子烧杀得血流满地，满目疮痍，一片萧条了。

日本鬼子对潮水镇大屠杀的历史，我们能忘记吗？

## 征稿启事

投稿热线：18653588630  
 投稿邮箱：xingzouyantai@126.com  
 行走烟台QQ群号：227321056  
 投稿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  
 润利大厦1605室    毛旭松  
 收    邮编：264003